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四五期 ——
(二〇一四年六月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406a)

【往事非烟】	荒谬年代中的北大历史系牛棚 ——《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导读	林博文
【亲历者说】	“八·五”祭——一场史无前例的教育大摧残	胡志涛
【自由论坛】	文革只有宋彬彬们道歉不够	徐友渔
【各抒己见】	对主流文革史写法的知识社会学分析(下)	老 田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二十八)	孙怒涛

小启: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 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 <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往事非烟】

荒谬年代中的北大历史系牛棚
——《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导读

• 林博文 •

“爸爸是‘黑帮’, 在北大拔草!” ——郝斌的四岁女儿听到托儿所老师的对话, 回家告诉妈妈

“我有罪! 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 ——北大学生喝令历史系名教授向达下跪毛像并复诵罪己词

“中国大学自五〇年代初期起, 紧追苏联, 院系调整, 改造大学, 又以思想为万事之先, 以致大雅无作, 正声微茫。及至‘文革’, 校园皆成战场, 师生半为寇讎, 荼毒心灵, 夺人性命, 一至斯文涂炭, 为华夏千年所罕见。” ——赵越胜:《我的老师周辅成先生》(《老照片》第七十七辑, 二〇一一年六月)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亲自出征北京大学，在东操场向上万师生员工痛批北大历史系教师郝斌迫害李讷。李讷何许人也？她就是江青（李云鹤）和毛泽东于一九四〇年在延安所生的女儿。郝斌说：“一九六四年秋天，农村里有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正名叫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俗名叫‘四清’，遍及全国各地。……在北大，还派出了四、五年级的学生，说是让他们去‘接触实际’……历史系的教师，走了多半，我也在其中，我就是在这场‘四清’中，与当时历史系五年级的学生李讷同在一个工作队，因工作中常有分歧，也有争论，才惹来一个‘迫害李讷’的罪名。”

文革期间权倾红朝的江青，在北大的讲话，是她在政治角斗场上的首次出击，炮火四射。除了郝斌中弹之外，北大校长陆平、“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等人也都遭殃，甚至连毛泽东的儿媳、毛岸青的妻子、中文系学生邵华，亦被点名。江青第一次出席万人大会发表火药味十足的政治演说，表现不行。郝斌指出：“只能算是见习水平，分数不能打得太高，她在火候分寸上，还欠缺拿捏的功夫。在点到我们几个人名字的时候，她竟然语带呜咽，情绪激动，甚至当众服药，弄得感情色彩重于路线斗争，让人看了觉得像是一个婆婆妈在唠叨，说的全是家务事。”郝斌又说，江青“说到伤心之处，她掏出手帕擦抹泪水，全然不像一个政治家在演讲，舞台效果因此大打折扣，以至事后‘伤身分’、‘水平太低；影响不好’的负面议论多处出现。”

中共“第一夫人”江青公开指控北大历史系教师郝斌迫害“第一女儿”李讷，在举国疯狂、全民撒野的年代，等于“反对伟大领袖毛泽东”，其罪可诛！郝斌迫害李讷“马上变成一桩政治事件。郝斌说：”当晚十时左右，经她一说，不需要什么法律手续，我的‘罪名’就算铁板钉钉，定下来了。而在一般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一方，他们对伟大领袖的热爱，顿时化为对我的仇恨。”郝斌从此被斗、被打、被踹、罚跪，各种身心上的凌辱，接踵而至。

中共于一九六二年年年底开始在农村推动“四清运动”（起初称“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改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一九六四年大规模进行，郝斌奉命下乡参加。“四清”运动被认为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奏，郝斌的大学弟代替他讲授《中国通史》现代部分。这个大学弟说他第一次讲这门课，恐怕准备不及，希望郝斌把讲稿留给他用。三年多以后，这位大学弟在批判会上竟然指控说：“黑帮分子郝斌反对毛主席不是偶然的，我手里有他的新罪证！”只见他手上一抖，说道：“这是郝斌上课的讲稿！全是他的白纸黑字！我念一段给大家听。”原来是郝斌在二十几万字的讲稿中，有关引述《毛泽东选集》的话，用“毛说”，而不是写“毛泽东同志指示”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大学弟向在场听众说：“革命群众听听，他居然把伟大领袖像美帝、苏修一样，称作‘毛’！他是多么的反动！”此时，在场的“革命群众”个个摩拳擦掌，准备痛“扁”郝斌。低头弯腰的郝斌，专心防范前面有人打过来，身高接近一米九的大学弟，竟从后面猛击郝斌的后脖颈，郝斌顿时倒在地上！批斗会结束后，郝斌被押出会场，”没想到有人从下面踢来一脚，踢到我的阴囊睾丸，我疼得站不住，立时倒了下去。”

中共在抗战胜利后未久即能够快速夺得政权，知识分子帮了大忙，从学术菁英到各大学校园，大家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失望透顶。陈寅恪、冯友兰、竺可桢、梁思成、汤用彤、俞大维、饶毓泰、姜立夫、严济慈、叶企孙和陈垣等中研院第一届院士都宁可留在神州，静观时变，等待“新中国”的来临而不愿到台湾或乘桴浮于海。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怒吼下，成千成万的大学生热切希望国民党政权崩溃，焦急地迎接共产党的胜利。

历史的事实是讽刺的、残酷的！中共建国后，最倒楣的就是知识分子，最可怜亦最可悲的也是知识分子！北大哲学系教授周辅成八〇年代末曾说：“四十年前，共产党掌权，当时的我在武大（武汉大学）任教。看到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热情，心想中国可能得救了。五十年代洗脑，诚心诚意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把自己多年的学术成果骂得一钱不值。”周氏又说：“四十年了，中国读书人吃尽苦头，前三十年是唾面自乾，自我羞辱……。”专研伦理

学的周辅成（一九一一—二〇〇九）在五〇年代初全国教育大改革和院系调整（主要是“以俄为师”，模仿苏联老大哥的教育制度）中，从武大转到北大。他说：“在一九五六年，大鸣大放后期，空气变了。”他在《我所亲历的二十世纪》回忆文章中举出几个例子，一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给我启蒙的舅父，在家乡一所中学任教，与党支部书记意见不合，后被归划为右派，以至连子女也不敢接近，孤独至死。”二是：“在一九五七年，一个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临到午餐休会时候，一位延安时期的著名理论家何思敬忽然起立说：‘目前阶级敌人、地主、资产阶级已消灭，是否可以少提阶级斗争或不提阶级斗争？’事隔不几天，‘反右’运动展开，何思敬因此便成为他的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全校‘大右派’。隔了两三年，我在路上见到他时，语无伦次，几乎疑心他是精神失常了。”三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位颇受人尊重的国学大师蒙文通在四川大学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把他留的胡子一根一根地拔掉。冬天，还要他下河水里去摸鱼，然后发动四周群众高叫‘蒙文通浑水摸鱼！’我想，在这情形下，不仅是年老的蒙文通，就是意志坚强的青年人，也免不掉要回家落泪寻死了。”四是：“在我身边的同事冯定，他是从苏联斯大林时代返回中国的理论家，后来被康生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全国性批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群众围集如山，要他出来交代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一个接一个地问，从晨八点钟直到晚饭前，站在门口，动也不能动，一天接一天，他受不了，曾两次服安眠药自杀，被救。后来，到江西鲤鱼洲劳动，我和他睡在同一炕上，只听他在我身边翻来覆去，白天还要他单独去捡猪粪，甚至在大堤上捡人粪，少了还要被骂。回来后在北大校园内的路上，我几乎不能认得他，他也几乎不认得我了。不久，他即卧病去世了。”

著有《庐山会议实录》并曾做过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一九一七年生），在《李锐口述往事》（香港大山文化二〇一三年七月出版）中说：“毛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属于一种很极端的个人，一切反常的事情他都敢做……毛泽东则是他自己说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什么事情都敢干，‘大跃进’死了那么多人，都无所谓，任性到了极点。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都不放在眼里，随心所欲。换了任何一个人当家，刘少奇也好、周恩来也好、林彪也好，都不会搞到后来‘文革’那样不可收拾的局面。”当过水电部副部长并曾坐过多年牢的李锐强调：“毛从骨子里是讨厌知识分子的。说到底，毛还是个农民，心胸极其狭隘，生活上保留了许多农民的习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上海复旦大学校园广播宣布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一位教授听到后，在四顾无人之下，说道：“多行不义必自毙！”但毛对国家、对同胞、对文化、对社会的严重伤害已经造成。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所著的上下册《墓碑：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中国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二〇〇八年初版、二〇一一年九版），用血泪记述了三千六百万人饿死的民族大悲剧。刘少奇当着毛的面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人相食要上书的。”刘早已认定毛的路线是造成大灾难的原因，他强调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做过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北京分社主任的贾斯培·贝克（Jasper Becker）一九九六年出版的《饿鬼（Hungry Ghosts）：毛的秘密饥荒》和香港大学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二〇一〇年推出的《毛的大饥荒》，都使毛的千古大罪无所遁形，难逃于天地之间。

郝斌这本涵蕴血、泪、汗的回忆，细腻而又真实地描述他在荒谬年代和恐怖岁月中的遭遇。郝斌擅长叙述，文字独特而又隽永，叙述苦难但又不失风趣，描写丑陋但又流露人性，使文革文献提升至更高一层的境界。作家章诒和从《往事并不如烟》的历史回眸点上，生动地呈现其父执辈友人在朝代巨变中的苦痛；郝斌则以史家之笔详述其在“牛棚”中的处境，为时代做见证，为历史留纪录。郝斌一九五八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所回忆的就是北大历史系在文革期间所遭受的重创。北大历史系执中国史学界的牛耳，也是学术界和教育界的龙头老大。整个北大在文革时代成为重灾区，尤以历史系为最。一九六六年夏天，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北大校园贴出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这张大字报，并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从此，中国最高学术殿堂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田地！北大各系的“牛鬼蛇神”（毛泽东创造的名词，黑帮一词则为康生所发明）被赶到校园上扫地或拔草，如同一个开放式的批

斗场。据北大文革委员会机关报《新北大》报导，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二十八日，一个月之内有两百多万人次专程到北大观看胸前挂着一块“黑帮分子×××”的牛鬼蛇神，有些“观光客”，不仅怒骂他们，甚至揪头发或拳脚相向。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包括郝斌在内的二十三名北大历史系黑帮被押往北京市北郊昌平县太平庄的北大半工半读基地，进入全封闭的劳营。一九六七年夏，号称文革“五大领袖之一”的聂元梓（女，一九二一年生于河南省滑县，山西晋城华北军政干校学习，一九六〇年调至北大，一九六六年出任北大文革委员会主任）的权力一度势衰，北大历史系黑帮被松绑五、六个月后，第二次被赶至太平庄。从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至一九六九年夏，郝斌等牛鬼蛇神被监管达三十个月之久。时至今日，受过迫害的北大历史系老人，已逐渐凋落，只有两位在回忆文章里触及到“牛棚”，但未深写。因此，郝斌的深度忆述，就显得格外有意义。北大教员工和学生惨死（所谓“非正常死亡”）于文革期间的有六十三人，历史系死了五个人，第一个殉难的是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得意弟子、郝斌的老师汪篪。一九五四年除夕夜，汪篪到学生宿舍吃年夜饭，喝醉了，就倒在一个学生的床上，和衣睡到天明。郝斌说：“在我们眼里，他随和亲切，思想又很深刻。”汪篪曾研究唐代名相魏征，而吴所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中的明人海瑞，颇有魏征的直谏风骨。文革初起，汪篪被一群无知盲动的学生诬指歌颂海瑞，在汪家开斗争大会，汪篪拒绝受辱，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以死抗议。北大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受尽各种屈辱后，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与妻子一起仰药自杀，还留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泽东及其无数爪牙蹂躏知识分子、践踏学者的狠毒手法，在中外历史上排名第一，凌驾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亦远非希特勒、斯大林和墨索里尼所能望其项背。有些史家认为毛泽东高居人类历史上的暴君之首，系因其兼具中国古代专制帝王与近代法西斯及共党独夫的残忍特质，视民如草芥、如粪土。但归根究柢，还是李锐点出了毛的特色：“毛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属于一种很极端的个人，一切反常的事情他都敢做。”李锐又说：“刚解放不久，毛泽东邀请周士钊一些旧人去北京，回到湖南以后，周跟我说了见毛的一些情况。毛邀他在中南海里划船，向他吟了一首诗，具体哪一首现在记不起了，反正表达的意思是：我现在像皇帝一样在中南海里邀我的臣子一同划船吧，那一种心态……毛把自己当作皇帝。我的好朋友黎澍一直在白区工作，没有去过延安。他一到北京，看到毛他们住进了中南海，就对我说：‘这不是太平天国吗？’”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北大历史系二十四名“牛鬼蛇神”在烈日下被罚跪，学生高喊：“跪下！全部跪下！”郝斌说：“这是我们‘文革’中遭遇到的‘第一跪’。”历史系的老教授向达和杨人梗跪到站不起来。郝斌又说：“控制平衡不栽下去，还算容易；精神和人格上能够承受住这种压力和羞辱，才是难关。”俞大维的妹妹、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纲，在郝斌等二十四人跪倒之前几天，被勒令当众下跪。郝斌说：“出身名门，精神优雅的俞先生，是一个视尊严重于生命的人，这个世界既然如此对待她，那还留恋什么呢？回到家里，她就从容、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消息刚刚传到我们耳朵里，还在心里震荡的时候，齐唰唰的一长排，我们也都跪下去了。”

中共十大元帅之一、前外长陈毅的六十七岁儿子陈小鲁和几个当年北京八中同学，于一九七〇年十月七日专程回到母校为文革时代的恶形恶状，向师长道歉。陈小鲁当时是北京八中造反派头头，八中的党支部书记华锦和教师高家旺自杀，支部副书记韩玖芳被打成残废。八十岁的张显传老师对陈小鲁等人说，“没有必要站出来道歉，你们也是受害者，当年是阶级斗争为纲，谁能不拥护？”陈小鲁说他自己的道歉已太迟了，但必须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他强调：“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他指出，“文革是个令人恐惧的时代！”这一点身历其境的郝斌最能体会其义，五十九岁的北京律师张红兵（原名张铁夫）最近亦为一九七〇年和父亲一起检举母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而导致母亲被枪决一

事，公开忏悔，他说：“自己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要被遗忘。”

在经济急速起飞、物质生活兴旺无比的时代，文革已被遗忘，年轻一代已不知文革为何物，更不知道毛泽东时代是个什么样的黑暗时代，“史盲症”已成普遍现象。文革对中国社会的戕害、对中国文化的亵渎、对中国历史文物的浩劫，似已成“如烟往事”！最可悲的是，近几年来，随着怀旧文化的兴起，缅怀文革、美化文革的现象，竟出现于一些社区。甚至有大陆留学生于十月三十一日万圣节（俗称鬼节）晚上，穿上红卫兵制服在纽约街头嘻笑游荡！

尽管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讲过一句很令人“泄气”的话，他说：“国家与政府从来不会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Nations and governments have never learned anything from history!）然而，从个人到整个民族，还是必须把握时间，深切反思文革，并要锲而不舍地探究文革的来龙去脉。唯有真诚地把文革摊在阳光下彻底检验，以史为鉴，中华民族才有能力建立一个民主、法治、透明、正义的公民社会。

二〇一三年深秋于纽约

□ 摘自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网站

~~~~~

#### 【亲历者说】

#### “八·五”祭——一场史无前例的教育大摧残

• 胡志涛 •

提起北京师大女附中，在北京市来说，算是一所有名气的中学。它成立于1917年。解放前，这所学校治学严谨，校风朴实，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解放前夕，不少师生倾向革命，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贡献。已故国画家王友石同志，当时在师大女附中担任总务主任，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1949年北平解放，我们华北育才中学随着解放大军进城。5月，师大女附中正式被接管，由解放区来的华北育才中学女生部与师大女附中合并。第一任校长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彭文同志。我当时是国文教员。

在新的起点上，女附中原来的教职工和解放区来的教职工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上下一致，优势互补，亲密团结，经过师生共同努力，形成了艰苦朴素、勤奋向上的校风，为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一代做出了较好的成绩。它是一所备受社会赞誉的北京市重点中学。截至1966年5月统计：解放后的初高中毕业生达7000余人。到了文革中期改为男女合校。现在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在我的一生中，工作单位曾多次变换，但要算在女附中待的时间最长，前后整整二十年。在这段不短的岁月里，有甜蜜和幸福，也有辛酸和苦辣。留在记忆中的人和事很多很多，最使我难忘的是1966年8月5日这一天。尽管二十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但每到8月5日这一天，在我的眼前总要浮现出我的好友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同志的悲惨遭遇，特别是她在临终前的惨景。她是在校园里出现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混乱、大骚动中，被一群纯真、热情，又是她最心爱的学生用种种残忍的手段活活折磨死的。这真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尊师重教”的大倒退，这个历史教训应该永远牢牢记住。

卞仲耘和我是在1946年晋冀鲁豫解放区人民日报社一起工作时相识的。她是安徽无为县人，生于1916年，家庭虽然富有，但父亲重男轻女，又因母亲早死，继母虐待，小时靠一个独身的姑母养大，生活很苦。她上学全靠哥哥支持，高中毕业后，在西北大学、燕京大学读书，后来毕业于成都齐鲁大学经济系。1941年，在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进城后，她来到女附中工作，起初担任政治教员。1956年，我担任副校长，负责学校全面工作，她担任党总支书记。尽管中间曾经几经曲折，1962年后，我俩又恢复原职，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直到文革开始。

她中等身材，白净的鹅蛋脸上经常带着笑容，一头自然卷曲的短发梳向耳后，显得格外文雅、朴素。她的性格善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说话从不厉声粗气。她能接近人，大家都愿意找她谈心。在她担任党总支书记期间，每次在市委或区委开会，她都能认真领会精神，一丝不苟地用她的一手秀丽工整的字又快又准地记下笔记。同志们听她的传达报告，感到详尽无误、清楚明白。对她的忠诚老实的工作作风，大家更是敬佩。她不愧是一个党的好干部。

1966年5月初，报纸上出现批判“三家村”的文章。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出笼。6月1日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内容。6月2日上课时，学生已出现不安定的情绪。课间操时，有几个高级干部的女儿在校内贴出了大字报，矛头指向还很模糊，有指向北京市委的，有指向北大彭佩云的。6月3日以后，上课已不大正规了，有的课上不下去了。教师每天照常到校，但都处在莫名其妙、不知如何是好的心理状态。

有一天，学生要求上街游行。当时上级有指示，不让学生上街。我们和教师同样处在不理解的心态下，急得赶忙跑到学生队伍的最前头，带头喊口号，带领学生在校园里转了一大圈，总算把学生留在校园里，没有上街。

这时，上级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站在运动的前面，加强领导。可我们谁也不理解怎么领导，领向何处？结果是领导不力，运动失控，学校已处于半瘫痪状态。6月13日傍晚，以胡启立为首的西城区工作组派了以张世栋为组长的五人工作组进入学校。住校生欢呼若狂，呼喊：“毛主席派人来了！”“工作组领导我们闹革命！”第二天，全校学生纷纷贴出大字报，欢呼工作组进校。校领导除了管总务的副校长外，全部靠边站了。在工作组领导下，成立了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有学生代表和教师代表参加。这时，大字报的矛头主要指向了校领导，但内容尚不具体。如“坦白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校领导是忠实执行旧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罪魁祸首！”“女附中是修正主义的大染缸！”不久，学生就在党总支办公室门上贴出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标语。党团员们看到这种情形，非常紧张不安。我很不理解，党总支是忠实为党工作的，它有什么可“坦白”的呢？又过了几天，在校党总支办公室后院的大墙上贴出了点名的的大标语：“揪出卞、胡、刘、梅、汪示众！”并开始称呼校领导为“黑帮”。（注：卞指卞仲耘，胡指胡志涛，刘指副校长刘致平，梅指副教导主任梅树民，汪指教导主任汪玉冰）学生纷纷组织战斗组，十六七岁的少女都穿上土黄色的军装，腰间扎着皮带。有的学生把辫子藏在军帽里，有的干脆剪掉，个别同学还把头剃成男式小分头。那些造反派的小头头带头赤着脚，卷起裤腿，大摇大摆进出校门，好像只有这样才是最革命的。

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后，大字报矛头所指便辐射开来，有的指向校领导，有的指向了教师。最先揭发我的所谓罪行的是：“胡志涛树立的黑样板——周学敏语文教学经验必须彻底批判！”（注：周学敏的语文教学经验曾在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展览过，《人民教育》1964年曾介绍过她的经验。）这使我更不能理解了，周学敏改革语文教学的经验，是全市教师学习的好典型，怎么会是黑样板？我当时也兼着一个实验班的语文课，曾向学生介绍过上海育才中学段立佩校长教语文的经验。我说他用启发式，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学生

对语文很感兴趣，作文内容丰富多采。他让好、中、差同学各自从自己原有的基础出发，起步学习。他还打个生动的比喻说：“这好比让学生飞的飞，走的走，爬的爬……。”学生在大字报上点名批判我，说我这样的教法是把学生引向修正主义。有的学生还批斗了自己的班主任。

大字报铺天盖地，表面轰轰烈烈，但揭不出什么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我当时质问工作组，为什么只许师生揭发我们，却不许我们揭发旧市委？他们的回答是：“现在是你们接受群众揭发批判、好好检查自己的时候。”在是非不分，好坏颠倒的大字报海洋中，学校更加混乱。

六月中旬，有些学生战斗组开始给工作组贴大字报：“工作组压制群众！”“工作组不民主！”“踢开工作组独立闹革命！”等等。工作组在处于非常尴尬的情况下，就设法组织批斗校领导大会。

6月23日的中午，天气很热，工作组把卞仲耘从新市委叫回来（工作组进校后，卞仲耘在北京饭店新市委组织的学习班里集中学习）。起先，新市委不同意，后来工作组再三要求，说工作有困难，这才让卞仲耘回来的。

大约在下午两点钟，批斗大会开始了。好几个学生把卞仲耘押上台，我和刘、梅、汪押在台下，面向群众。大会上，一个曾做过人事工作的干部说：“卞仲耘包庇原语文教研组长唐x”，并且胡说唐是中统特务。这简直是陷害！在不容本人申辩的情况下，必然激起学生们的愤恨。几个高年级的学生跑上台，就用学校自制的枪头包有铁皮的假步枪，你一枪，我一枪，几枪就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天气很热，又刚吃过午饭，卞仲耘受不住毒打，吐了一地，全是未消化的饭菜。就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也不管，还继续让卞仲耘站着，听一个从校外找来的女人控诉，说卞仲耘破坏她家庭的幸福。这真是莫须有的诬陷！大会开了三个钟头，我们都90度大弯腰，下来后手、脚、脸都发肿了。“这符合党的政策吗？”我心里非常气愤。

会后，工作组立刻把我叫去，问我：今天的会开得怎么样？我沉默了一会儿说：“群众发动起来了。但是，你们让校外一个女人来控诉卞仲耘，这对吗？”工作组长没说话，我就走开了。

这场批斗会后没几天，卞仲耘从市委回校了。她和我在一个办公室“学习”，她见没别人在屋，便悄悄地撩开后襟让我看。“哎哟！”我失口叫了一声。她后背的皮肤被捅掉了一大片，刚刚结上疤。我真不明白，难道这场运动的矛头是针对学校基层领导？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随意批斗人？

7月20日左右，工作组把校领导和全体教职员弄到石堆子马神庙小学集中学习，不许回家，由学生代表主持会议，让每人准备“洗澡、下楼”，实际上是人人过关。教师、职员都编成小组，有的小组已有一、两个教师“下了楼”，他们都是成分比较好的或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的。校领导天天自己准备，等待“下楼”。我们彼此之间不许交谈，和教师也不能接近。经常有学生代表监视着我们的行动。

大概过了一周，工作组忽然悄悄地撤了，学生代表也走了，教师中胆大点的也有先走的，但校领导成员不敢擅自离开。有一两个晚上，只听见对面外国语学校的高音喇叭里吼叫：“我们不要保姆！踢开保姆闹革命！”最后，干脆没有人管了，我们也就回来了，仍天天到校“上班”。

这时，听说毛主席从武汉回到了北京，党中央正在开会。我想，以后该不会随便批斗人了吧。

8月4日下午，我们几个领导干部正集中在办公室里“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气势汹汹地骂道：“黑帮！不许动！”她们有的拿棍子，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我爱人看见我身上被抽打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我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明天你暂时别去学校了。”“我是校长，不去学校怎么行？”

1966年8月5日，我起个大早，“找市委去！”思索了半夜的一个念头驱使我向市委走去。脑子里一大串的问号都想到市委能得到解答，特别是昨天出现的打人现象。我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向他陈述了工作组进校以来的情况，以及7月底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处于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我特别强调了昨天的打人问题，我说：“这说明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了。请指示，我们该怎么办？”他听后却用平静的口气劝说道：“你回学校去吧！”我站着没动。这时，我多么希望他能说出一句：“你们回避一下吧，先不要到学校去了。”他站起身来看我不走，又补充了一句：“回去吧！我们会向区委通报的。”我怀着沉重而失望的心情走出市委的大门，一路上，脑子里开展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回去！回去！回去！明知是凶多吉少。但我是校长，我是一个长期受党教育的共产党员，上级指示，我只有服从。无论如何，我得硬着头皮回去。

回到家里，午饭也吃不下，吃了几口便放下碗，心想找区委去。走到区委，接待我的一位同志，也同样劝说：“我们知道了。你还是回学校去吧！”这使我更加失望。现在，市委、区委都不管了，叫我们这些早已靠边站的基层领导干部，面对这种极其混乱的局面，又能做些什么呢？……

大约下午一点半钟，我怀着极端矛盾的心情走进校门。校园里异样地寂静。我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急急忙忙走进办公室，只见卞仲耘和几位教导主任还呆呆地坐在那里“学习”，头也不抬。我压低了嗓音对他们说：“你们还坐着哪？”“还”字加重了语气。可他们好像没听见似的，默默无语。这时，我独自跑出办公室，到哪儿去呢？昨天被学生用皮带抽打的情景使我警觉起来，今天又会发生什么不幸？万一要再打我，我绝不能束手待毙……想到这里我一手拿起一把扫帚，一手拿起一只铁簸箕，朝着后院的女厕所走去。在这里，我可以观察一下动静，有人来，就装着打扫厕所。

半小时光景，意料中的风暴终于来临了！只听见外面有人群在走动，有人大声叫喊：“胡志涛！胡志涛！”我赶紧弯下腰扫地。跟着进来一大群学生：“好哇！你在这里。”不容分说，架起我的两只胳膊就往外走。走到去操场的路口，有一个工农子女班的学生手捧一个从总务处拿来的大墨水瓶，正要往我的身上泼，嘴里还嚷嚷：“看你这黑帮！”我不愿受侮辱，反抗思想促使我忘记了险恶的后果，猛地举起扫帚向大墨水瓶挡去。霎时瓶子飞向天空，墨水四溅，连我带周围的学生全成了“黑帮”。这一下可就闯了大祸！她们用拔河的大粗绳把我的一双手腕紧紧地捆了起来。

“游斗”在校园里开始了。无数只拳头随着“打倒黑帮！”的狂呼落在我的身上。接着，推推搡搡，把我带到操场的中心，终于把我打倒在地，头上还扣着一只纸篓。我仰躺在地上，从纸篓的筐眼里看见湛蓝的天空，心想：“这回可要去见马克思了！”这样，我的心情反倒平静起来，好像周围一切都不存在了。我多么想好好地睡一觉哟。

过了好一会儿，有一只手猛地把我的拽起来，摘下我头上的纸篓，厉声地对我吼：“走！到后院去。”我在一群学生的簇拥中走向刚才去过的女厕所。一个领头的学生叉着腰，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们这些黑帮，平时不劳动，今天，让你劳动，好好改造！”另一个高个子的学生命令我：“把毛坑上的木盖都拿出来，刷洗干净。”我把一二十块木盖都从厕所里拿出来，在水池边准备刷洗。“我去找个刷子。”我向学生们请求。一个拿着木棍儿的学生大声喝道：“黑帮！老实点。



不许用刷子，就用手抠！”我只得蹲下去抠。她们立刻把我拽起来：“不许蹲着抠，低头！”又把我的头摁下去：“弯着腰抠！”我不得不低着头弯着腰成90度，用双手抠洗那一块块又硬又脏又臭的毛坑盖。

一块两块三块……十几块抠洗净了。我的手指甲盖磨去了半边，露出鲜红的肉来，钻心的刺痛使我实在抠不下去了。我直起腰来想歇一会儿，几个学生立刻又把我摁倒，不许抬头。到后来，只要我直一下腰，就打我一棍子，打得我头上、肩上、背上、臂部一阵阵剧痛。我实在支撑不住，没力量再抠了，她们又用带钉子的木棍往我的身上一阵乱打。血从我的大腿上和着汗水往下流，眼前发黑，我不由自主地晕倒在地……“起来！别装死！”几个学生把我拉起来。我颤颤地站立着，已不成人样了，泥水、粪水、汗水、血水把我浑身都染污了，我真的成了“黑帮”了！

一辆平板车推过来，在我的身旁停下。“你看！”我一看，车上盖满了大字报，上面还压着一把大竹扫帚。“你把它掀开！”我用双手拿下扫帚，又一层层地揭开大字报纸。“老卞！”我几乎叫出声来。她的两眼直北地瞪着，已没有反映，嘴巴张着，呼噜呼噜地吐着粗气，两只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了一条条伤痕。我用手摸摸，滚烫滚烫。我忘记了自己的伤痛，也忘记了自己的处境，急忙向周围的学生呼求：“她的瞳孔已经扩散了，快！快！赶紧送医院抢救！”平时，她们是我倾注满腔心血培育的学生，朝夕相处，亲如家人，但现在她们却完全失去了人性，失去了理智，凶神恶煞似的向我吼叫：“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我被她们推搡着关进了办公室。

老卞是和我共同战斗过二十年的老战友，我不能让她就这样地死去。我要管！要管！可我自己还被关在屋里，门外学生监视着，我怎么管？！我的心在燃烧，血在翻滚。我一次次站起来向窗外看望，一次次被监视我的学生制止：“黑帮！你老实点，不许你看！”

这时已是黄昏了，太阳的光照依然很强。我从屋里往外偷看，那辆平板车还停在那里，没人过问。那群对我施加拷打的学生都四散得无影无踪了。我再次向站在门外监视我的两个学生恳求：“请你们赶快把她送往医院抢救吧！”其中一个回答：“不用你管！”是啊！自从工作组进校后，我早已失去了校长的职权，我已成了被人任意抽打的“专政对象”，我能管什么呢？……

夜幕渐渐地落下来了，我看看肿胀的手腕上那只被污水模糊了的手表，时针正指在7点上。窗外有人走动，不一会儿，校医带着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把卞仲耘用担架从北门抬出去了。

又过了好久，一位老工友好心地从我家里拿来一套衣服：“换换吧！您的衣服又脏又破，没法出门啦。”他看我换好衣服，又护送我回家。家里人见到我都惊呆了。除了一双脚，我浑身上下都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腰痛得不能躺下。我的爱人急忙设法找到一辆汽车，直驶北大医院。爱人和女儿搀扶着我走上医院的楼道，一位五十年代从女附中毕业考上医科大学的学生迎面走来，她一眼认出我来，赶紧伸出双手握住我的胳膊说：“老师！怎么把您打成这样！这帮学生心真狠！”她急忙带我到急诊室，对值班医生说：“她是我的老师，女附中的校长。”为了消除医生的顾虑，她又补充地说出她的观点：“搞运动绝不能乱打人啊！再说党有政策，在没有分清两类矛盾之前，应该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嘛。”经过拍片检查，证明是腰椎脊突骨折。在当时的情况下，住院是绝对不可能的，红卫兵天天到医院查看有没有“黑帮”住院。

回到家以后，不幸的消息传来：老卞被送到邮电医院后，抢救无效，终于停止了呼吸。“她确实死了！”我默默地坐着，泪水模糊了眼睛……

伤痛折磨着我，多少个夜晚都不能安静地睡去，偶尔合上眼，老卞临死前的惨状又出现在

眼前。我苦苦地思索，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好书记，一个学生爱戴的慈祥可亲的好老师，为什么偏偏会死在自己学生的手里？！

事后，据我所知，在北京市，卞仲耘同志是第一个死于自己所热爱的学校、死于她亲手培育的学生手里的老师。事情虽然过去了二十年，可在我的印象里仍然是深刻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8月5日这一天。但愿我的这篇祭文能够使后来者引以为鉴，在书写新的历史篇章时，不会再出现像这样悲惨的一页！

1986年于北京

□ 摘自《生活教育论》，安徽教育出版社

~~~~~

【自由论坛】

文革只有宋彬彬们道歉不够

• 徐友渔 •

宋彬彬在表示道歉和感谢的见面会上第一句话是“没想到会这么快”，这很奇怪。在我看来，公开的道歉和说明实在是来得太晚了，应该早很多，很多，事情已经过去快半个世纪，她本人年近70，有的受害老师快90岁了。正因为太晚，才使一些不确实的说法长期流传而得不到纠正，才有那么多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

宋彬彬说的话有两个方面，一是道歉，二是辩解，而且真正的重心落在澄清和辩解。可能有人会对她道歉的真诚性表示怀疑，从而不接受或责难她的道歉行为。我认为，揣测动机没有必要，没有意义，我更想强调，道歉时可以做出说明和辩解，因为我们的一切评论和判断都必须基于事实。宋彬彬尤其有权利、有必要对过去发生的事作出说明，还原历史真相，因为关于她本人，关于她和卞仲耘之死事件有许多传言是不确实的。如果一个法庭不允许被告申辩，那这个法庭一定不是公正的，它作出的判决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长期以来，关于宋彬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有许多传言，有的骇人听闻但没有根据。比如，有的说她亲自参加了殴打卞仲耘致死的暴力事件，还有的说她亲手打死了好几个人。我在自己研究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著作《形形色色的造反》中引用过这种材料，这种误信、误传不实信息的做法可能扩大对于当事人的伤害，我在此向宋彬彬女士道歉，保证再谈此事时不再重复不实之词，并作必要的澄清。

根据宋彬彬的这次发言，以及以前发布的材料，我想可以肯定的是，宋彬彬不属于对卞仲耘殴打致死的凶手，她也没有在其他场合亲手打死人，长期流传的类似不实说法应该得到澄清和纠正，基于这些传言对宋彬彬的批评应该停止。至于她在卞仲耘之死事件中的责任，她的名字改为“宋要武”所产生的恶果，还有她对自己责任的认识和评价，那当然还可以争论，也一定会有争论。但是，一切争论，一切不同的看法，都必须基于事实。

我记得，几年前当我读了刘进关于打死卞仲耘的8·5事件的材料和其他有关材料之后，我马上就作出判断：说宋彬彬直接参与打死卞仲耘的事件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还写了一些文字，对于以前传布不实说法表示纠正和歉意，并同意办网站的朋友发表。以我的经验，不论传言多么久远和广泛，不论人们的偏见有多么深，事实本身还是最有力量。我为这种澄清来得太晚遗憾，我相信，如果调查材料及早公布，哪怕会被一些人认为是一面之词，会引起争议，但至

少也有一些像我这样的人，会深思、比较，采信正确的说法。

我希望，所有研究和叙述文革的学者、作者，一切有关问题的写作者，都重视宋彬彬本人和刘进等人的澄清与说明，如果有过对于北师大女附中 8·5 事件不符合事实或不准确的描述，都要立即更正。我坚信，这种更正并不影响我们对于文革的批判，对于文革真正责任者的追究，但对于宋彬彬本人，却影响巨大，不管你对她抱有好感还是恶感，即使你不想对她本人的处境和声誉负责，你也必须对事实真相负责，对历史负责。事实是最坚硬、最有生命力的存在，一个人，哪怕被很多人不喜欢，他说出的事实仍然是事实；一个说法，哪怕它充满道义感，本意是要替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说话，如果不符合事实，仍然没有说服力。正义感不能代替事实或弥补事实方面的缺陷，反而会因为与事实不合（或不完全相合）而受到损害。

另一方面，我不愿意看到，这次宋彬彬等人对于事实的说明和澄清演变为对于以前控诉和批判文革中暴力与迫害的质疑或否定。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以前的指控是建立在歪曲事实和谣言的基础上，有关研究者的指控是出于对于宋彬彬的个人成见。如果说宋彬彬曾遭到污名化的委屈，那么事情起源于把“要武”这个恶名强加于她的文革发动者。“要武”与全国性的武斗和暴力事件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号召“要武”，文革发动者还命令军队把武器发给一派群众组织，以剿灭另一派，还说什么中国“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顶着“宋要武”名字的宋彬彬当然与全国性的武斗没有关系，但既然领袖把这个名字赐予她，也就使她摆脱不掉地成为武斗的象征和符号，要怪只能怪把这强加给她的个人和体制，而不能怪群众。如果宋彬彬不敢或不愿正视、谴责最高领袖对她的污名化与伤害，把怨气集中撒在致力于揭露和批判文革暴力的人身上，那么她的说明就难于奏效，还会激起反感，维持和加深对于她的已有误解，这对她本人和中国人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都没有好处。

宋彬彬终于公开道歉了，这是一个迟来的道歉。她的道歉引起了关注和议论，但人们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最快、最本能的反应是：谁最应该道歉，谁是最有责任道歉的主体？显然，这不应该只是单独的、普通的个人，不管他们在文革中怎样做错事或作恶。至今为止，道歉者都是响应号召、卷入文革的普通人，那么，对于发动文革应该承担责任的个人或团体呢？要知道，文革是在隆重的会议之后，根据会议的正式决议进行的。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曾经有过对于文革的否定性评价和分析，但这与道歉是两回事。

我们知道一任又一任德国领导人是如何为二战道歉的，我们更知道，我们是如何要求日本领导人对中国道歉的，那么我们自然要问，仅有陈小鲁、宋彬彬等人的道歉，够吗？

□ 摘自《腾讯文化》2014-01-15
~~~~~

【各抒己见】

对主流文革史写法的知识社会学分析（下）

• 老 田 •

（上接 z k 1 4 0 5 c）

三、从底层文革派的“有色眼镜”看文革

就全国文革期间的群众运动而言，研究者较多地关注了北京和上海的情况，其实这两个地

区的代表性很差，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两个地区的群众运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着直接的联系，这在全国其他各省区都是不存在的；二是这两个地区的群众运动过程相对单一，到1966年冬天以后保守派的活动就很不明显了，这也是全国比较特殊的案例。

## 1、如何界定文革政治实践的起始时间：造反派的造反行为与组织成立

无论上层的政策设计是怎麼样的，但是，作为文革不同于其他政治运动的首要特点是“群众运动”，而且文革的群众运动的首要特点还在于有一个独立于党政官员控制之外的造反派组织。如果以这个特点来看待文革的话，很显然，造反派组织何时兴起以及造反派组织何时开始其政治活动，就需要作为文革实践的标志性事件来看待，以此而论，文革的实践过程其起始时间最早也只能追溯到1966年6月底（这个时候北京的高校里开始出现“驱赶工作组”的少数派力量）；7月底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公开出席高校的群众大会，为少数派平反，并支持他们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北京是9月7日成立“首都三司”这个全市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武汉市是10月底才成立全市性学生造反派组织。11月初全国多个城市都出现工人造反派组织。1966年10月份开始出现全国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因此，就文革的实践层次而言，开始时间不仅晚于《五一六通知》而且也与这个文革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没有关系，这个文件是作为机密文件只下发到县团级，普通群众看不到；而且，造反派的造反行动也不是《人民日报》社论影响的结果，而是认为“反右派”这样一种“整人”方式不正当并且不符合中央精神。从这个时间和事件的排列可以看出，文革中间底层文革派的力量形成过程，不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也不是文革小组从外部操纵的，而是对于当权派与保守派合作整人的方式提出批评意见，由此受到沉重的政治打击，由此激发了少数派更强烈的反抗意志，这种反抗意志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受到周总理和文革小组成员开始公开支持，在《十六条》精神的鼓舞下，通过批判“资反路线”的努力，于1966年9—10月份才完成批判力量的组织化过程。

造反派的视野里，文革实践的起始时间，与中央上层的各种分歧和争论的关系都不大，是从工作组或者党委“面对面”发动群众开始的。武汉当权派发动的文革，是把文革当做是第二个反右运动来搞的，这与《五一六通知》这样的中央文件没有关系。而后来成为保守派和造反派的两派群众组织，也是肇因于整人或者挨整的差别，其中保守派是当权派按照原有的政工工作系统直接组织起来的，是当权派“正向动员”的结果，造反派则是因为受到整治打击而被“反向动员”出来的。当权派造就底层两派群众及其之间的对立内容，这都跟中央的指导性文件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符合“官场惯习”。

等到造反派正式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之后，群众中间的派别分野和对立就彻底明朗化了。在这个现实面前，当权派实际上没有可能保持含糊态度，而是必须自己选择“站队”——你到底支持造反派还是支持保守派。官员在群众公开分为两派之后，也必须公开选择“站队”，站在那一边则是文革派和反文革派的关键指标，这也是一次“自下而上”的政治过程——基层的问题和分裂出现之后，上层需要相应地作出自己的选择，这些至关重要的选择，政策的指导作用几乎看不到，官员也是根据自己的感受和官场惯习作出判断的。

## 2、从文革实践提出来的中心命题：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1966年《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之前，先出现过“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方向路线错误”两个提法。针对工作组发动党团员积极分子（多数派）在高校批判“右派”和“黑帮”的运动方法，就早已受到广泛的质疑和批判，这就是最初产生的“反工作组”的少数派，在7月底的时候地质学院已经有少数派，贴出大字报把工作组和多数派合伙干的事情冠名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加以批判。毛泽东7月底批评工

作组的错误时用的是“方向路线错误”这个提法。在9月18—20日文革小组主持的座谈会上，决定写一篇社论来批判文革初期工作组的错误，最初也是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经过几次反复之后，才最后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这里可以看出，造反派的造反内容——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从来没有在文革指导性文件中间被预先指出或者规划过，而是从具体的实践中间提出来的，然后，政策设计才紧跟这个实践中间出现的中心命题。

1966年10月正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全国各省市党委领导运动及工作组和多数派的错误，就逐步归结到“资反路线”的名义下给予批判。同一篇社论还要求干部重新站队：“党中央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过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正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立场、正确路线上来，而不要发展到同党对抗的地步。”10月5日中共中央批发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规定：“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19）此后，就要求犯了资反路线错误的干部重新站队，陈伯达在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间还提出“重新站队”的具体标准：“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认真平反，并且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20）

### 3、各级政府组织中间绝大多数当权派反对支持造反派的中央决策

追溯造反派的造反历史及其力量的集结过程，可以方便地识别出来文革实践的起始时间，通过检验对造反派的造反是支持还是反对，可以识别出当权派中间的文革派成员，毛泽东、周总理和文革小组成员是文革派，而各级干部中间的绝大多数是“反文革派”。林彪本人泛泛地支持过发动群众批判干部、支持为那些运动初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人平反、推动制定交还“黑材料”的中央文件，但是在军队内部特别是针对空军、海军司令部和总后的文革实践中间，林彪是支持保守派的。后来定为林彪集团成员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反对造反派的，属于反文革派阵营。全国各省市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反文革派。在造反派眼里，中央高层支持群众造反运动的人很少，只有毛主席、周总理、文革小组成员，早起还要加上林彪，这个很小的名单构成“顶层文革派”，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刘邓靠边了，决策层次上支持群众造反的优势就更明显了。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说周总理在文革期间“说了一些违心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这个说法暗指周总理是反对文革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中认为中央文革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总理，这个说法是可信的。从文革早期的中央领导发表讲话支持群众造反看，发表讲话次数最多的就是周总理，翻阅《周恩来年谱》也可以看到，周总理出面接见并支持造反派的次数，比任何一个文革小组成员都要多。文革伊始，周总理自己就选定浙江作为自己的试点省，还派飞机把张永生（后担任“省联总”一号勤务员）接去北京，亲自教育他如何领导运动，并向省长周建人进行政策交底，要他支持造反派。（21）在提出“一月夺权”之后，周总理非常积极地指导“夺权”试点，在外交部试点夺“运动领导权”“业务监督权”，支持造反派建立部司两级业务员监督小组；在广播局试点连“业务领导权”一起夺过来的经验。其实，对于文革是否必要的认识，主要是奠基于对官场的判断，如果认为多数干部还不错，文革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反过来，如果认为官场问题格外严重而且当权派不能自己革命的话，显然，发动群众的副作用哪怕再大也是必须的，看一下周总理1963的讲话《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就知道他对于官场的判断是比较糟糕的。

各地官场中间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极少，省委书记中间全国仅有河南的刘建勋是支持造反派的，绝大多数是公开反对文革并镇压造反派的，这构成文革的一大特点：政府内部决策层次因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分量很重所以占据优势，文革早期各项政策出台多是有利于造反派的；但是决策需要通过各级干部这个庞大的执行层次去实施，而执行层次的大多数干部恰好是坚决反对的，因此，中央文件很难执行，结果中央文件对于运动的指导作用很小。1966年10月发出的中央文件要求把“黑材料”当众销毁或者交换本人，给群众平反昭雪，但是，武汉的“黑材料”大多数是造反派组织抢出来的，而不是主动发还的。

文革期间政权组织内部“执行层次”反对“决策层次”的后果是：文革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结果出现顶层文革派支持最基层的群众组织造反，反对庞大的中间执行层次这样一种景观。

#### 4、底层文革派与顶层文革派的不同政见

在造反派看来，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和文革小组的支持，造反派不可能产生和存在，这是上下一致的地方。即便是这个方面，底层造反派也是有意见的，在造反派遭遇到的系列镇压中间，来自上层的支持，在时间上总是滞后的，在力度上也显得不足，而且越到后来的支持力度就越小。在批评工作组的“资反路线”时期受到的支持是最大的，不仅支持给受打击的群众平反，还支持群众组织起来批判当权派的资反路线；此后的支持力度就越来越小了，1967年反击二月逆流和抗暴时期，支持在时间上不仅严重滞后，力度也严重不足，仅仅是支持给造反派平反，但是不支持造反派追究责任人——批判“军内一小撮”。在造反派看来，1967年720事件之后应该继续“揪军内一小撮”追究政治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在1968年夏天之后解散群众组织的“倒旗”运动也有很多中学生不满意。1969年武汉的“反复旧”还受到周总理的批评，只好终止，这个批评之后实际上已经不许再搞大民主了；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形势很好，但是毛主席直接下令停止的。

1967年年初成立的革委会中间，都没有结合保守派组织头头，到这年秋天的时候，中央已经决定三结合不排除保守派。这就意味着，对于保守派不仅不给予批判，放弃追究他们的责任，还要结合保守派进入革委会，这也是很多造反派有不同意见的地方。1968年在谈判建立辽宁省革委会的时候，对“辽联”（支持东北局的一派）“辽革站”（支持沈阳军区的一派）和“八三一”（造反派）三派同等对待，张翔久站起来表示坚决反对，结果被隔离到卫戍区。（22）武汉如果不是因为百万雄师搞了七二〇事件也肯定是要结合的。

在1976年开始的“揭批查运动”之后，许多造反派头头锒铛入狱，此后，一些造反派对于毛泽东和周总理等顶层文革派的意见反而逐步消失了。

#### 5、“舆论博弈”的“个人崇拜”外观

造反派和当权派之间的政治上的不兼容，表现为两种相互对照的舆论博弈策略：造反派通常批判当权派“反毛”，当权派和保守派往往批判造反派“反党”。当权派的舆论策略中间，试图把当权派自己不符合政策和法律的行为也与党组织捆绑在一起，从而规避批评；而造反派在后来的大批判中间往往批判当权派“反毛”，说当权派只顾自己的利益和特权，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等等。很多人往往从表面上看问题，认为文革期间常常出现“以言获罪”的反人权政治迫害，这是删除了派性政治的内在逻辑之后，才会出现的皮相之论，政治迫害的问题不是以言论治罪，而是不兼容对方的政治利益已经成为先在目标，然后才搜集对方的言论用大批判的方式证明对方是坏人，这是服务于目标的手段。

造反派为什么不直接批判当权派的资反路线，转而用那种“要为毛主席打抱不平”的舆论策略呢？这大概与当权派和保守派组合的力量优势紧密相关，也就是说，造反派不太有把握斗得过对方，为了规避可能的政治风险：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名义与强势群体“扳手腕”，而不是从自己的冤屈出发去控诉当权派的倒行逆施。1967年北京造反派处于鼎盛时期所编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间，就充满这种语言和机巧。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在自己受到批判的时候，还非常强硬地要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在运动后期“交出几个右派来”。在武汉的文革之初，王任重就提出过“枪打出头鸟”“引蛇出洞”“秋后算账”三大策略，这对于弱势的造反派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威胁，采取“捍卫毛主席”的发言方式，算是一种“弱势群体”的竞争方略，从文革的实践看这个自我保护的策略并不成功。前面提到清华大学两派斗争中间都用“路线斗争”的语言进行“伪装”，其外观也一样具有“个人崇拜”的表象，群众组织间的大辩论，核心问题一样是派性政治的不兼容问题，这是第一位的。

## 6、巨大的派性政治能量导致过多的策略和权宜之计，降低了政治信誉

文革期间政治上的“派性”非常严重，派性的一个特点是不兼容对立派的政治利益，而且每一个派别内部都存在着“为派性的增长而添砖加瓦”的积极分子群体，这个派性积极分子群体还往往以“本派利益代言人”的身份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力和领导权，这个积极分子群体的存在使得调解和弥合派性的外部努力难于起作用。

文革自从两派形成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就有了内在的推进力量：受到派性的推动而脱离预先规划的轨道。派性政治的强大能量，实际上使得1968年之后中央对各种重大事务的处置，丧失了最优选择乃至次优选择，大多数都是策略性地应付。过多的策略和应付措施，损害了政治信誉，助长了各种对于政治的失望情绪。文革从派性政治中间获得“自主”前进的动力，对于派性政治缺乏分析，这也是主流文革史的重大遗漏。

## 7、毛时代的政治异化：文革期间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问题

从造反派自己受迫害的经历出发，可以观察到“坏干部+假积极”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我倾向于认为，这个同盟在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中间就起到了关键作用，〔23〕在文革早期的工作组时期，更是有突出的表现，这个同盟的存在恶化了大多数人的政治状况。造反派批判当权派和保守派，实际上已经触及到毛时代政治异化的关键内容，这是造反派的政治代表性所在。非常遗憾的是，出于对派性政治恶性发展的担心，毛本人没有办法支持造反派对这个关键的政治异化机制进行深入批判，反而说“犯了资反路线错误，站过来就是了。”对于群众中间那些专门搞政治投机的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也说要“在同学中间取消保皇派这个词”。在武汉水院成立革委会前后的争论中间，造反派提出“二代红就是二代机”——即很多文革前党委的红人在文革早起一样工作组的红人，在文革中间又以造反的面目出现要钻进革委会，这个观点推论下去就是要重新设立发展党员的标准，彻底改造基层的政治，堵塞投机分子变成党团员的通道，进行某种制度方面的建设。〔24〕不过在文革派性政治的背景下，这个说法一出来就引起“前保守派”成员党团员、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强烈反感，视为“老造反派”想要垄断革委会席位的手段，不仅没有起到正面的建设作用，确实导致无原则的派性斗争的升级。毛泽东1967年10月提出“建党五十字方针”——“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在文革的大背景下，毛泽东这个说法，实际上被造反派理解为对自身政治敏锐性和问题意识的一种肯定。

总之，在派性政治的背景之下，不要说解决问题，就是制度建设的第一步——正确地提出问题——就做不到，这个方面的努力未能深入下去，是那些理想色彩较浓的造反派也对文革失

望的一个原因。

#### 四、小结：展望一种真正的文革研究

从武汉文革的实践看，中央层面在文革期间采取的各种步骤，无论是1966年打倒“彭罗陆杨”还是1968年打倒“杨余傅”，无论这两件事正确还是错误、公正还是不公平，都与文革基层的实践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在机制。把基层的群众运动排列上层的各种步骤之下，实际上梳理不出来逻辑一贯的叙事，反过来的写法可能更为可取，把基层的文革实践作为主线，把上层的种种步骤放置在对基层运动的“影响因子”的位置上进行考察，可能更为有利。三本公开出版的主流文革史，除了可以混淆造反派与保守派这个问题之外，在写法也陷入逻辑困境：想要排列上层的种种步骤，并把这个作为主线，然后再强行把群众运动“剪切”成合乎需要的材料，这种写法本身就是不可能成功的。

甩开对立派别基于政治利益关系的博弈，试图从毛泽东或者文革小组“操纵”文革群众运动出发，去梳理这一段复杂的政治过程，这也是不可能成功。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合写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这本书“更加具体地凸现出毛泽东对文革的独特作用这一条主线”（唐少杰评语），就陷入了这个困境，首先是没有办法找到足够的文献材料支持作者从这个视角展开叙述，这迫使作者不得不捏造证据来自圆其说。因为要证明一个人控制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就必须建立一个联系全国的“命令链”和“信息链”与群众组织进行沟通，在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要通过数百万官员队伍去联系全国民众，给定毛泽东的操纵效率高出十倍百倍，恐怕也要依靠数以万计的联系人，才能实现操纵文革群众运动的目的，而一个数以万计的组织是不可能秘密存在的，最后，作者不得不在承认在自己“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编造一些惊人的说法：“在文革开始之际，秘密‘耳目’——伟大的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用这个词来指代皇帝的间谍——遍布中国。”“毛的‘耳目’活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工厂、学校、国家机关等普通公民工作的场合秘密地运作着，其中有些是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在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时这算是一个优点）。不幸的是，在毛了解事情以及与同事相处中，他们起了什么作用，对此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原书第四章）与国内出版的文革史相比，作者要说毛泽东更多的坏话，却找不到足够合适的证据，证据对于结论的短缺程度更为严重，这个严重的矛盾就鲜活地体现这一段看起来就像精神错乱的语言中间。

换句话说，文革研究的主要问题，除了要摆脱那种特定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之外，还需要走出“上层主导”的狭隘观察视野，在这种视野里就已经潜在地引入了“行政操作逻辑”，这恰好与群众组织中间较高度度的“无政府主义”（或者说行政操作的色彩最低）特色截然相反，“自上而下”的有色眼镜带来的局限性就可想而知了。而从底层的群众运动这样一个实践层次出发，这不仅可以规避“上层证据短缺”的问题，也更有助于梳理文革的种种曲折演化过程。

注释：

（1）参阅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

（2）“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写、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报》编辑部修订：《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印，1967年12月

（3）同上

（4）对傅军胜的访谈，2007年

（5）对张培信的访谈，2006年

（6）《湖北省委书记处、常委部分会议记录》该件是手写的复写件，颜兵提供。该件主要内容



是1966年6—10月期间湖北省常委会议的部分发言记录，复写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五七干校材料纸”上，时间是1969年的反复旧运动时期。据干校对造反派的审查材料，这份材料是颜兵（省团委科员）等人于1967年1月从省委送武汉军区保存的档案中间“抢出来”的，因为军区不愿意把材料交给造反派群众，颜兵等人把省委副秘书长高开元（材料送交者）找来围攻29小时，终于迫使高同意从军区拿出材料交给造反派。

〔7〕《“庞然大物”原形现 纸船明烛照天烧——公安联司谈〈百万雄师〉》，载《七月风暴》第4卷第21—27页，武汉市直红司《七月风暴》编辑部，1967年10月28日。

〔8〕《“出土文物”（全文影印件）》自印本，该件是河南省郑州保守派头头杨全志的日记，原件上送给中央纪检委，相关领导还有批示。日记记录1967年1—7月期间保守派组织主要头头李蔚、赵正夫等人的决策活动。文革后，李蔚任河南省委纪检委副书记，赵担任过省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这两人都文革后都参与领导河南“揭批查”运动造成严重扩大化。

〔9〕武汉钢二司红武测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七月）一九六七年八月

〔10〕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附录，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

〔11〕《烈火·永生——怀念胡厚民》自印本，第39页

〔12〕肖健卿、李近川主编《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第21页

〔13〕《烈火·永生——怀念胡厚民》自印本，第65—66页

〔14〕对柳英发的访谈，2003年

〔15〕对翁森鹤、张永生的访谈，2005年

〔16〕李仕林等：《清华“全面内战”期间的第三种声音》，载作者博客。

〔17〕对古正华的访谈，2004年

〔18〕埃德加·斯诺著、伍协力译《漫长的革命》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3—14页

〔19〕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1988年，第132页

〔20〕同上，第136页

〔21〕对李显通的访谈，2005年

〔22〕对周总理联络员老李的访谈，2007年

〔23〕老田：“反右扩大化”与“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形成——谈谈“党史造谣学”的方法论基础

〔24〕对丁家显的访谈，2013年10月

□ 原载《共识网》2014—04—10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二十八）

• 孙怒涛 •

〔上接zk1405c，第九章 清华之后〕

第二节 清理“三种人”，风声鹤唳毛毛雨

1982年年底，中央发文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所谓“三种人”，就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邓小平说：这三种人“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要把他们清洗得干干净净”。薄一波说：“三种人比日本鬼子、国民党警匪还要坏”。

这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对“三种人”的痛恨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巩固这些重新上台的“走资派”的统治，并为他们子女的接班腾出位置，扫清道路，要把“三种人”从领导班子和党的队伍中统统清理出去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更何况，老百姓对这样的“三种人”是深恶痛绝的。

问题是，什么叫造反起家的人？什么叫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什么叫打砸抢分子？这些都是很笼统的概念，无法严格界定，也无法准确掌握的。这尺度，就像一根松紧带，宽严就全看主管运动的领导掌握了。说你是，你不是也是。说你不是，你是也不是。每次运动，都是一批人整治另一批人的好机会。

这是一场新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准确地说，这是继清查五一六以后对造反派的又一次整肃。清查五一六，是毛泽东对他曾经支持过又被他抛弃了的造反派的清算。当年的造反派，都已经只剩下悠悠一口气。清理“三种人”，是文革中被造反派整惨了的“走资派”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秋后算账。在“走资派”眼里，造反派就与庆父一样，“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造反派不斩草除根，他们认为国无宁日。

在造反派中，在造反派头头中，确实有不少坏人，或者说，有“三种人”。但是以运动的手段针对这一群体进行“清理”，仍然沿袭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遗产，恶果依旧，并无新意。

我来浙江省计算所已经二三年了，是一名身无半职的一线科技人员。一直老老实实的夹着尾巴做人，已小有业绩，从来就没有想往上爬的心思。至于我在文革中的那点真不是什么问题的问题，也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做了“一般错误”的结论，档案中的材料也被告知烧掉了。这次还会不会像翻烙饼一样的再翻我一次呢？

在我调动工作的时候，我对调入单位清楚交代我曾红卫兵头头，是414的二把手。我不敢相信关于我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在我的档案材料中已经不留痕迹了。免得自己今后被动，免得新单位的领导为难，还是预先讲清楚要主动点。

新单位的同事多数也知道我在清华当过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实在太有名了，一听说是清华的造反派头头，都以为我与蒯大富是一伙的，想问又不敢问。

那个时候社会上的各种小道消息传得邪乎恐怖。我竖着耳朵，听着风声，心里多少有点忐忑不安，不知道这次我会遭遇什么样的厄运。

果然，有一天，研究所的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了。他们可能不摸底，也可能已经摸底了要再找我谈谈，这都很正常。态度也是比较和善的，并非审问，而是“了解情况”。我就把我在清华文革中的大致情况汇报了一下。他要我写一个书面材料。于是我写了一份《关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经历（66年—76年）》，在1983年8月29日交给他。

这份材料我选了一个比较中性的标题，因为我想还不到做检查交代的时候。我写得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按照清查五一六的审查结论，我也写了自己的“一般错误”。为了澄清我不是蒯大富那伙人，我特别强调我是414的头儿，而414是蒯大富的对立面，是与蒯大富的极左斗争的。我特别说明我在文革中“从未参与过抄家、游斗干部等活动”，以撇清与“打砸抢分子”

的关系。

材料交上去以后，没有动静。我非常关注所里的动向。有一段时间，我明显感觉到我是在被调查了。因为有一位所里的中层干部长时间在外“出差”，我感觉有点反常。

多年以后，我的直觉终于得到了证实。

当时研究所的同事中有一位清华校友，他是自704班的老刘，我们是同系同专业的，他比我低一届，调到所里的时间比我早一年多，已经是研究室的主任了。他工作能力很强，深得领导的赏识。

他说，那时领导向他调查过我的情况。他实事求是地做了介绍，也解释了当年清华文革运动的背景。

他是一个为人很好的高干子弟，又是老四。我相信他对我有所照应的。

虽然，我自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运动中，整你还是不整你，并不取决于问题的大小。一个清华来的当过414二把手的名头，一个“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的罪名，对于那些想积极表现，想以此大做文章的领导来说，足够有理由整我一通的了。

清理“三种人”期间，虽然有冷飕飕的“风”掠过脸颊，但没有电光闪闪雷声滚滚的风暴降临到我头上，只是下了点毛毛雨，实属万幸。

我在怀柔搞“四清”的时候，大队里有一个曾经当过小特务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当时听公安给我们介绍，他没有血债（要是有了血债的话，早就在镇反运动中给枪毙了），只是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中干过事。公安对我说，地富分子表现好，还可能摘帽子，对这样的历史反革命，到死也不可能摘帽子的，他们永远都是内控的对象。

我过去不清楚内控是什么意思。文革以后我才慢慢感觉到了，我就是一个被内控着的异类分子。我档案中那些告知我已经被烧掉的材料是真的烧掉了，还是只是哄骗我其实依旧保留着？我是强烈怀疑的。即使所谓的交代材料、外调材料都烧掉了，甚至审查结论也烧掉了，我依然感觉到我是一个被打入另册的人。没有人宣布过清查五一六运动是错误的，审查结论也不会作废。即使有一天说清查五一六运动是错误的，我当过造反派头头的历史是不可能抹去的。风平浪静的时候，可能过着与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但是在好些重大事情上的待遇还是非常不一样的）。一旦社会上有点风吹草动，政治形势有点动荡，我总感觉到背后有两只狼一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原以为入了党，能把政治污点对冲了，掩盖了。其实不是那回事儿。那张党票在关键时刻，与一张废纸无异，顶不了什么用的。

这就是我的宿命：一年多的头头，一辈子的代价！

第三节 六四，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1989年夏天，一场由悼念胡耀邦逝世引发的以“反官倒”、“反腐败”为主要口号的学潮从北京波及全国各地。杭州的大专院校学生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声援北京。

那段时间，在我上班的路上，经常碰到游行的队伍。我只能推着自行车，站在街边观看。

我看到的游行队伍是守秩序的。打的标语，喊的口号，都是预先准备好，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游行的组织者往往在游行队伍两侧最外边安排了手拉手的一排人，负责不让外人混入队伍，保持队伍的纯洁，以免节外生枝。也常见各类警察在道路两旁维持秩序，疏导交通。整个游行的气氛是平和的。要说有“过激”的行为，是那段时间里各类车子的车身上，不管车主愿意不愿意，都被贴上了各种标语或者用墨水涂写的口号。

我们这群经历过文革的人，碰在一起常常会说：看透政治了！要是再遇到这类事情绝对不会当傻子了！确实有不少人汲取了教训，对政治不再关心，不再参与。但是我们这群人中的大多数，从中学开始，继而大学，又经过文革，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好像已经溶化在血液里，渗透到骨髓中，很难做到超然世外。当然，要参与进去自会有很慎重的考虑，但是要漠不关心，是很难做到的。

在学生自觉维持队伍防止外人加入、民警两旁警戒维持秩序的情况下，我只能站在马路边看着他们，或者在游行队伍的末尾推着自行车缓缓地跟随一程。我想，我要是大学生，一定也会参加这样的游行。或者，如果我的单位有人出头组织这样的游行，我也会参加的。因为“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实在是深得民心。

我们研究所里确实有一位很有群众威信的员工带头组织过一次游行。很遗憾，那两天我正好在外地出差，没能参加。

六四事件，被定性成反革命暴乱。据说，在天安门广场上示威群众高喊反对腐败的口号，是给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抹黑。书写打倒特权的标语，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这些统统都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反革命言行。民众的集会、游行、抗议、示威，如果当政者认为危及了政权的稳固，不论曾经说得多么天花乱坠，镇压起来是绝不手软的。六四，最后以所有善良的民众事先绝对想不到事后无法接受的血案而告终。军队的神圣职责是抵御外敌、卫国保民。但是，“人民的儿子”下令“人民子弟兵”开着坦克碾过天安门广场。我感到万分震惊！震惊于这种连凶残的北洋军阀、黑暗的国民党独裁者、万恶的四人帮都不敢冒的天下之大不韪，居然都做得出来！我所敬仰的伟人，他所开创的改革开放让他的英名流芳百世，他举起屠刀镇压学潮也把他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万分悲痛，悲痛于死难的同胞竟然丧命于他们热爱的党、政府和军队之下！这不只是某个人的恶行，而是极权体制的严重弊端和重大缺陷造成的。我从青少年时代建立起来的十分真诚的信仰，经历文革后已经疑窦丛生，摇摇欲坠，这一次终于在血淋淋的残酷现实面前轰然倒塌、彻底摧毁了。我问自己：十几年前，我还在积极争取入党，最终成为一名党员。我要入的难道就是这样一个站在民众对立面上镇压民众的党派吗？

我原有的信仰就这样“死”了。新的信仰又难以建立起来。那种似乎是缺少了灵魂的痛苦，比始终没有过信仰的，更为痛苦得多。好在，我还有点良心，有点拷问良知的勇气，凭此，聊以度过我已经不多的余生，支撑老眼昏花的我看着民主的大潮在一点点冲刷专制的堤坝。

六四热血青年是爱国的，他们也是一心为党的。他们所有的言行都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之内，他们表达政治诉求的方法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他们并没有反党，他们并不是要共产党下台，而是希望共产党跟上时代的步伐，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民主进步，希望社会公平正义，希望百姓过上富足的有尊严的日子。对他们的镇压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有罪的。

长期以来，反党就是反革命，就是敌人，就要镇压，就要专政，这已经成了执政党的惯性思维和不容怀疑的铁律。我的一位朋友问我：如果有一天，民众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示威游行，表达对执政党的不满和反对，难道就一定是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吗？执政党对民众的暴力镇压难道就是天经地义的吗？现代民主与封建专制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封建专制下，反对朕、反对朝廷，即便是非暴力的，也一律镇压。而在现代民主下，面对民众的反对，执政党是绝对不可以对和平示威的民众施以暴力的。部分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和反对，说明执政党存在着亟需改正改进的地方，执政党应从中得到教训以重新取信于民。总之，执政党对民众的态度，也就鉴别出执政党手中的权力，究竟是民众授予的公权还是仅为一党私利而霸占的私权。

六四以后，各单位又是照例开展了清查。这次因为我没什么行动，所以很太平，没什么麻烦。不过我心里并不感觉侥幸。我暗想，要是碰到这样的机会我还是会参加的。即使再被清查一次，也不在乎这辈子多一次清查了。

在老四这个朋友圈里，对六四的态度也是不尽相同的。绝大多数是同情学生、支持和平请愿的。也有个别我们戏称是“坦克派”的，认为不坚决镇压的话，共产党就要下台，国家就要大乱，改革开放的大业就要半途夭折。

旧时的派别早已消亡。过去曾经志同道合的好友，经过若干年以后，面对一桩重大的政治事件，各人有自己观点，甚至针锋相对、泾渭分明。过去相信“红线主导”论的保守人士，如今好些人对前三十年和现体制持批判的态度。过去信奉“彻底砸烂”的激进人士，如今不少人对现体制反而更持肯定的观点。值得庆幸的是，明知道对方的观点立场与己不同，互相已不再扣帽子、打棍子、贴标签，已能心平气和地交流、探讨、争辩，这充分说明了经过文革洗礼的我们，大多数已经有了理念上的进步，政治上的成熟，以及“一笑泯恩仇”的境界。

第四节 哀思，在谢晋澄的“墓”前

有一年，我到北京出差，与好友相聚。

现在，派组织早已消亡，派利益荡然无存，派性也已成了历史陈迹，但是派的印迹烙在我们这些人生的人生轨迹上，因此形成了浓重的派情结、派友谊，终生都难以忘怀。对我来说，派友谊既包括与414派的友谊，也包括与蒯派、“八八”派、团派的友谊。

席间，谈起了清华文革，谈起了百日武斗，谈起了多位遇难的同学，谈起了谢晋澄，大家唏嘘不已。其中有位好友说，他知道谢晋澄葬在何处。一听这话，我们都说应该去看望看望他，于是驱车前往。

凭着心中的记忆，这位好友终于找到了谢晋澄的“墓地”。他向我们叙说了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

谢晋澄是在1968年4月29那场武斗中，在九饭厅前被汽车冲撞活活碾压而死的。他的父亲从老家赶到清华见了宝贝独子的最后一面。火化后，他的同学们为他选了一个质地尽可能好一点的骨灰盒。

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生最大的悲伤。这位悲痛欲绝的可怜父亲，临走的时候已经抱不动重如千斤的骨灰盒。

当时学校还在武斗中。骨灰盒怎么办？一位家在北京的同学站了出来，二话没说，抱起骨

灰盒，就存放到他的家里。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大家的生活都不安定，谢晋澄的骨灰盒，在该同学家里一保存就是10年。然而，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他与几位好友一起商议，大家决定还是入土为安最为妥当。

葬于什么地方？怎么安葬？这是最为煞费苦心的难题。方案一个个提出，又一个个否定。

北京，清华，是谢晋澄追寻梦想的地方，也是他梦碎魂断的地方。比较了好些可选择的地点，最后大家决定，那就让他长眠在北京，安葬在一个比较宁静的他能遥望清华园的地方吧！

某天，夜深人静之时，有几个中年人手捏铁锹，肩扛水泥，提着水桶，捧着骨灰盒，来到预先勘察过的地方。

铲起草皮，挖好深洞，洞底铺上厚厚的泥浆，小心地安放好骨灰盒，再把泥浆浇注在骨灰盒的四周和顶上，回填泥土，覆盖好草皮。

等到一切都做妥以后，几个人站立四周，默默地致哀、告别，然后悄然离去。谢晋澄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安葬在毗邻清华园的一方净土之中。没有仪式，没有悼词，甚至没有做一点明显的标记。

当我们来到“墓地”的时候，我想起，这个地方我在校的时候也曾来过。印象中，十分荒芜冷清。如今，这里松柏成荫，绿草茵茵，斜坡向阳，清静肃穆，无意中，这儿成了一块风水宝地。

“墓地”上没有墓碑。“墓碑”就立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这一行头发花白皱纹满面的故交旧友，在春意盎然的季节里悼念我们的好兄弟，百感交集。我们悼念他，不是因为他牺牲得多么伟大壮烈，而是因为他死得太不值得太可惜。他是不幸的死难者。他以他的死揭示文革是个大劫难，以他的命控诉极左路线的罪大恶极，以他的“墓”告诫后人不要再重演他这样的悲剧。

当年的厮杀呐喊已经销声匿迹，这些年来谢晋澄听到的是后生学子们匆匆行进的脚步声。

当年的腥风血雨已经无影无踪，这些年来谢晋澄闻到的是远处飘来带着芬芳的书卷气。

清华宣称正在向世界一流大学挺进。是成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殿堂还是培养听话出活驯服工具的衙门，我们这些已经远离清华行将就木的老人，只有请谢晋澄替我们就近“见证”了。

清华百日大武斗中十几个死难者，我唯一认识的就是谢晋澄。此时，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他是那样的年轻，那样的充满朝气。我心中的旧伤再次绞痛！

谢晋澄的安葬之地，只有极少几个人知道。这也许是414最后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也将随着我们的陆续逝去而成为永远的秘密。

每次来北京，回清华，我都要到这里来凭吊谢晋澄。一到谢晋澄“墓”前，我心里总会记起并祭奠那些我认识的、更多的是我不认识的罹难者，他们中有钱萍华、姜文波、孙华栋、刘承娴、卞雨林、许恭生、杨志军、朱玉生、段洪水、李磊落、杨树立、范仲玉、罗征敷等一长串名字。这些文革死难者，都值得我们悼念和记忆。

在团四两派争斗期间，还有更多的身心遭受巨大伤残的受害者。他们是（仅就我现在所知

道的极不完全名单)：

在 1. 4 武斗中和百日武斗中身负重伤和较重伤的江道波、郭创贤（已去世）、戴××、吴栋、周忠荣、周建秋、周坚、葛伍群、张继昆、姚清信、董庆祥、李光鸣、张南清、宿长忠（已去世）、汲鹏、王允方、程××、姚××（已去世）、霍玉金、龙铮山、李光鸣、赵厚福、时作隆（已去世）、谭昌龄（已去世）、马耀开、陈××、光积昌、唐应武、陈天晴、刘万章、党建国、杨振华、崔丕源、杨明杰、李文斌、曹大安、欧阳北辰、钟成国、王文中、谢德明、郭福鑫等。

曾被关押过的罗征启、文学宓（已去世）、李康（已去世）、饶慰慈、陶森、陶德坚（已去世）、吕应中、谢引麟、黄安妮、张琴心、陈楚三、陈育延、叶志江、曾昭奋、俞善乐、杨立人、左羽、贾振陆、陈家宝、贾××、邢竟侯等。

我是策划、鼓吹、推动、实施两派分裂的主要头头之一，而两派分裂是造成日后武斗的原因之一。作为 4 1 4 的第二号头头，我参与了 4 1 4 几乎所有重大的决策，对于 4 1 4 所犯的错误都负有或主要或次要、或直接或间接的责任。我也发表过许多过激的极左的错误言论，写过许多派性的上纲上线的大字报，打击、批判过不同意见的干部、教师和群众。每当想起两派争斗期间死难的师生以及受我伤害过的人，我心里会有深深的自责和愧疚。我借此书向你们（以及我在这里没提及的）说一声：对不起！我有责！我知错！

我衷心祝福你们及所有健在的朋友们健康快乐、晚年幸福！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 0 1 3 年 2 月第一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